

危機下內地增長模式變遷

全球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之際，恰逢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各種媒體關於三十年時代變遷的回顧總結報道鋪天蓋地，一時之間，上下幾十年的歷史倒影與肆虐於縱橫五大洲的金融海嘯彼此交錯、相互映襯。立證標下，對於內地經濟短期發展的擔憂似乎掩蓋了長期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考，各種危機應對政策舉措紛紛出台的背後，如何平衡短期速度和長期發展的內在矛盾、協調短期政策的長期制度效應，應該成為一個不能忽視的立足點。



在出口導向難以為繼，以及消費需要尚需時日的情況下，加大投資成為內地短期經濟增長動力所在。(影博圖片)

處改革與開放的十字路口

回首內地三十年的經濟轉型與發展，經濟發展速度與社會體制變遷之間的直接聯繫清晰可見，GDP的數字隨著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的演進呈明顯的階段性周期規律，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以政治性力量驅動力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態勢明顯，政府歷次大型的政治變動和政策調整都直接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雖然計劃經濟模式持續迅速地被市場經濟所取代，但是在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中，政治依然是主導一方，用內地的概念即是改革促進發展。

以亞洲金融危機和加入WTO為標誌，內地的對外經濟開放和聯繫逐步加強到一個可以直接決定內地經濟發展態勢的程度。國際經濟環境逐漸成為主導內地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之一，其直接標誌即是中國貿易依存度的迅速提高和國家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一個間接證明則是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中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在內地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對外開放成為促使政治經濟市場化、現代化發展的最活躍因素，用內地的概念即是開發促進改革。

而今，在前所未有的國際經濟危機高勢下，已經

與外部經濟息息相關的內地經濟，走到了一個改革與開放的十字路口。作為問題的產生，是外部經濟的突然變化引發的國際環境惡化，是為開放產生的問題；作為問題的解決，則需要內地政府在自身政治語境下，通過改變經濟政策提振經濟，是為改革的問題。內外問題的交互，改革開放的交織，將會成為內地政治經濟發展的又一歷史性標誌。

高出口高儲蓄模式走向拐點

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之所以產生如此劇烈的經濟社會震盪，其根本原因恐怕在於全球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衡——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下的過度消費造成的貿易、財政雙赤字，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高出口下的高順差和高儲蓄，失去了長期以來保持的微弱平衡。這次以金融危機為肇始的經濟危機，是全球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的一次總爆發，既標誌著美國式的高消費和高赤字模式的終結，也預示着中國式的高出口和高儲蓄模式走向拐點。

然而，在如此劇烈的經濟危機之下，內地徹底改變現有發展模式恐怕並不現實，尤其是在內地需要保持適度經濟增長以減輕社會就業壓力的制約條件下，

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需要平穩妥妥，以免經濟形勢惡化之下社會矛盾激化。

因此，在出口導向難以為繼和消費需要尚需時日的情況下，加大投資成為內地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動力所在。而此次中央政府提出的四萬億元投資計劃，似乎就暗合了這一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邏輯。但是，短期有效的背後，如何保持對於長期方向的清醒態度，則會成為考驗內地經濟的根本挑戰。

未來經濟增長的兩極

尋找內地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還是要回到三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基本政治經濟邏輯，即通過政府的主動政治政策調整，釋放長期為僵化制度所壓抑的生產要素。在內地作為發展中和轉型經濟體的基本面沒有根本改變之前，政治的驅動力仍將長期主導內地經濟發展的模式變遷。這一點，即使是在已經基本完成了經濟追趕任務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也仍然沒有改變。

而在可以充當內地未來經濟引擎的兩大領域——農業和金融，則更為明顯的反映了政治驅動的潛力所在。從農業來看，內地十三億人口中仍有八、九億仍是農民，農村、農業和農民作為所謂的影響內地基本政治經濟格局的三農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局促於各種歧視農民的政策之中，難有善解。而中央政府最近推出的農民房產和農村耕地的改革舉措，則如果繼續擴大下去，則會促使農村土地向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制度變遷，相信可以實現佔內地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收入消費結構的變遷，進而實現內地整體消費結構的變遷。

而另一經濟增長點——金融，作為各國政府管制的重點行業，尤其是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下，對於內地政府決策層的市場化信念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最近幾年的內地金融市場化發展，已經有力的推動了內地經濟的不斷發展。內地金融機構在此次金融海嘯中損失並不嚴重，這是可喜可賀之處。但是，如果認為金融危機的啟示是繼續嚴格控制金融產業市場化和國際化，則是大錯特錯。相反，更應從內地的金融產業落後的發展現狀出發，擬定更能促進金融產業模式變遷的經濟政策，利用歐美金融業相對衰落的機會，打造一個可以貫穿製造業和一般服務業的強大的金融產業。

何順文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學院院長兼教授
李元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